

主编●刘泽华

中国政治思想史

(秦汉魏晋南北朝卷)



中国政治思想史

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）

主 编 ● 刘泽华

副主编 ● 葛 荃

撰稿（按姓氏笔划）

刘泽华 杜洪义

宗德生 张分田

葛 荃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李 宁

封面设计:池长尧

责任校对:李育智

中国政治思想史 (秦汉魏晋南北朝卷)

刘泽华 主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印刷
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 (杭州谢村电厂路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8.125 插页 3 字数 41.5 万 印数 1—4000

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13-01108-1/D · 165 定 价:30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秦始皇的帝王专制思想	(1)
第一节 皇帝至上理论的高度发展	(1)
第二节 皇帝极欲与重罚主义	(4)
第三节 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	(6)
第二章 汉初思想家对汉帝国的政治设计	(10)
第一节 陆贾的通变政治思想:仁义与无为的结合	(11)
一 天人合策、统物通变与因世权行论	(12)
二 仁义与无为的结合	(15)
三 兴亡在君与道高于君	(18)
第二节 贾谊的崇仁尚礼和以民为本的治安论	(22)
一 论攻守之术和对汉初无为政治的批评	(23)
二 以礼定制:正名号、严等级、尊天子	(25)
三 以民为本:施仁义、行博爱	(27)
四 “道”重于权势 以权势行“道”	(29)
第三节 《礼记》的以礼、乐治国论	(32)
一 礼、乐的必然性与绝对性	(33)
二 礼、乐——社会制度、行为道德、认识情感一体化	(37)

三	君为心、民为体与君主专制主义	(41)
四	“大同”理想与“小康”之王制	(45)
第四节	晁错的尚法与重农战思想	(47)
第五节	《淮南子》的无为政治思想	(51)
一	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	(51)
二	《淮南子》的成书及其主旨	(52)
三	法自然与无私	(54)
四	顺时变法与礼法	(57)
五	顺人情与以民为本	(60)
第三章	汉帝国的政治“大一统”与独尊儒术	(63)
第一节	《春秋·公羊传》的“大一统”政治思想	(64)
一	《公羊传》与公羊学	(64)
二	王权“大一统”	(66)
三	论等级原则	(68)
四	论君臣关系	(71)
五	君统传延	(73)
六	华夷之辨	(74)
七	结语：《公羊传》的理论结构与政治地位	(77)
第二节	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政治论	(78)
一	天的体系与天人合一	(79)
二	君权至上与“一统”政治	(83)
三	以天道制约君主	(91)
四	阴阳合分论与礼制	(95)
五	以德治天下	(98)
六	“道”的永恒与经权论	(102)
第三节	独尊儒术与汉家制度	(104)

Z270/4813/12

一 西汉中期的政治状况和关于政治指导思想的争论	(104)
二 独尊儒术	(106)
三 汉武帝的杂霸政治术	(109)
四 汉元帝尊儒	(114)
第四节 《盐铁论》中的王霸之争	(117)
一 盐铁之议与《盐铁论》	(117)
二 王道与霸道之争	(120)
三 盐铁之议中的政治批评	(131)
第四章 儒家政治观念的经典化与社会意识化	(134)
第一节 《五经》崇拜与神圣化	(135)
一 《五经》神话	(135)
二 孔子神话	(138)
三 《五经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后真理	(139)
第二节 汉代政治中的儒家精神	(142)
一 孔子为汉家制度说	(142)
二 等级、朝仪、封禅、明堂与儒家的尊君思想	(144)
三 “《春秋》决狱”与儒家伦理道德刑法化	(148)
四 经义：政治的准则	(154)
第三节 忠、孝观念的社会意识化	(161)
一 孝与忠的价值构成及其行为规定	(162)
二 忠和孝的相通互补及其政治意义	(168)
三 忠孝义务与忠孝观念的社会意识化	(172)
第四节 经学思维方式与儒学之分化	(176)
一 经学化的思维方式	(176)
二 经学的多样化与多元化之争	(184)

第五章 君权的合法性理论与君权调节论	(200)
第一节 君权合法性与天、圣、道、王的相通和相辅	(201)
一 天君一体	(201)
二 圣王相通	(204)
三 道王同体	(208)
第二节 君主称谓与帝王权威的垄断性	(211)
一 君父:全社会的宗法大家长	(212)
二 王、辟:无上权势的化身	(216)
三 天子:君的神格与君命的神圣化	(219)
四 圣人:制礼作乐、拯救人类的英雄	(222)
五 皇帝:天地君亲师的集合体	(225)
第三节 道义制约君主论	(227)
一 臣对君主的相对制约思想	(228)
二 以虚幻权威制约君权	(235)
第四节 罪己诏中的政治调节观念	(239)
一 畏天崇圣与罪己诏	(239)
二 罪己诏与政策调整	(241)
三 罪己诏和帝王统治的正当与合理	(244)
第六章 西汉后期的政治调整思潮与王莽的复古改制思想	(248)
第一节 西汉后期的政治调整思潮	(249)
一 统治者内部调整思想	(249)
二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政治调整	(259)
第二节 更命思潮	(265)
第三节 王莽的复古改制政治思想	(272)
一 更受命	(272)

二	复古改制思想	(276)
第七章	东汉前期谶纬化的经学政治观与怀疑论	(280)
第一节	东汉初期刘秀集团的“柔道”与集权思想	(280)
一	刘秀君臣的崇儒思想	(281)
二	以“柔道”治国	(284)
三	并官与集权思想	(287)
第二节	汉代纬书中神、自然、人一体化的政治观念	(290)
一	神、自然、人一体化：“大一统”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	(291)
二	君主专制主义精神	(295)
三	均平、无为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调整	(300)
第三节	《白虎通义》神化王权与三纲五常的“国宪化”	(306)
一	帝王的神圣性与至上性	(307)
二	三纲五常的神圣性与绝对性	(309)
第四节	王充对汉代经学统治思想的怀疑与批判	(313)
一	“天道自然无为”论及对天人感应、谶纬神学的批判	(314)
二	“人无性知”论及对神化圣人的批判	(319)
三	“古今不异”论及对经传崇拜的批判	(322)
四	时命论和王充思想的内在矛盾	(326)
五	《论衡》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	(331)
第八章	东汉后期的名教与政治反思思潮	(333)
第一节	东汉名教思潮	(333)
一	汉代孝治与名教思潮	(334)
二	奖励名节 表彰孝悌	(336)
三	伦常教化	(339)

四	孝廉取士	(341)
五	“浮华交会”与名教的衰落	(343)
第二节	东汉末年党锢与清议思潮	(346)
一	党锢及其根由	(346)
二	清议思潮及其政治意义	(349)
第三节	东汉末年的政治批评与反思思潮	(354)
一	对昏君和封建官僚的抨击与反思	(356)
二	关于重整政治关系的反思与设计	(362)
三	论用人之道	(369)
四	论治国之道	(381)
五	关于经济政策的反思与措施	(398)
六	东汉末年政治批评与反思思潮的理论特点	(402)
第九章	早期道教和《太平经》的政治思想	(410)
第一节	早期道教的政治思想	(411)
一	道教的思想渊源	(411)
二	早期道教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	(414)
三	早期道教理论与东汉政治	(417)
第二节	《太平经》的善恶观和太平理想	(420)
一	“兴善止恶”论	(420)
二	君臣民“并力同心”说	(424)
三	“尊道重德”的治国思想	(429)
四	太平盛世的政治理想	(431)
第十章	汉末魏晋时期的名法与名理思潮及玄学政治思想	(435)
第一节	汉魏之际的名法思潮	(435)
一	刑礼先后之争	(436)

二	君臣关系	(439)
三	综核名实	(444)
第二节	东汉末期的名理思潮	(447)
一	名法之治与名理思潮	(448)
二	以探讨人物鉴品为核心的名理学	(449)
第三节	玄学中的名教与自然之争与政治思想	(458)
一	何晏贵自然与用名教	(460)
二	王弼“名教出于自然”的政治哲学	(465)
三	嵇康、阮籍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政治观	(484)
四	裴頠的崇有论和名教与无为相结合的政治思想	(495)
五	郭象“存在即合理”:名教合于自然的政治思想	(499)
六	玄学政治思想的特点	(508)
第十一章	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思想的多元发展	(510)
第一节	两晋及南朝儒家政治思想的承传与发展	(511)
一	论王朝更迭与王权合法性	(511)
二	君权至上与君臣关系	(515)
三	礼制与教化	(519)
四	九品官人法与贤人政治	(524)
五	法治与“议复肉刑”	(527)
第二节	北魏统治集团治国思想的儒学化	(535)
一	北魏前期统治者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认同	(535)
二	孝文帝的孝治主张	(544)
第三节	佛教的政治思想	(547)
一	佛教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影响和贡献	(548)
二	佛教与名教的关系	(555)

第四节	道教的政治思想	(557)
一	论儒道关系	(559)
二	道释关系	(563)
三	道教与现实社会政治的关系	(566)

第一章 秦始皇的帝王专制思想

秦始皇以所向披靡的武力扫灭了山东六国，南平百越，北退匈奴，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。然而，巍巍浩大、令人瞠目的秦帝国仅生存了十五个年头，就被民众反抗的烈火烧毁了。秦朝的大起大落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课题，政治思想也是其中的问题之一。

秦始皇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取得胜利的。那么秦的灭亡是不是也应归咎于法家呢？后来的儒家大多持此论，其实，事情并不这样简单。从历史的联系看，秦朝许多号为法家的东西，有不少被后来崇儒的帝王，乃至儒家所继承，因此对秦朝的政治思想要作具体分析。

第一节 皇帝至上理论的高度发展

先秦法家，特别是韩非，极力倡导绝对的君权主义。秦帝国的建立在实践上为强化君权提供了历史条件，同时，皇帝至上的理论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。

在秦始皇之前有“皇”和“帝”的称号，如“三皇”、“五帝”，战国时期的秦昭襄王、齐湣王分别称为“西帝”和“东帝”。《管子·兵法》说：“明一者皇，察道者帝。通德者王，谋得兵胜者霸。”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皇和帝连起来，称“皇帝”的帝王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问题，而是帝王观念的实现，它把帝王的尊贵推向了一个新高度。

功盖一切，这是皇帝至上理论的基础。丞相王绾与李斯等上书称颂秦始皇为千古一帝：“今陛下兴义兵，诛残贼，平定天下，海内为郡县，法令由一统，自上古以来未尝有，五帝所不及。”（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）泰山刻石颂扬秦始皇“建设长利”，“化及无穷”（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）。琅邪刻石中说：“皇帝之德，存定四极。诛乱除害，兴利致福。节事以时，诸产繁殖。黔首安宁，不用兵革。六亲相保，终无寇贼。”“功盖五帝，泽及牛马，莫不受德，各安其宇。”（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）碣石刻石中说：“黎庶无繇，天下咸抚。男乐其畴，女修其业，事各有序。惠被诸产，久并来田，莫不安所。”总之，秦始皇把整个天下带入了和平与安乐的境界。应该说，这类的颂扬是言过其实的，但它在政治思想上却有极端重要的意义。既然秦始皇给天下带来了无限的美好，那么他就有权支配一切，拥有一切。事实上，他正是这样宣传和这样做的。

秦始皇在刻石中一再宣称他是天下的主宰，在琅邪刻石宣布：“六合之内，皇帝之土。”“人迹所至，无不臣者。”（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）周青臣在进颂中也讲：“他时秦地不过千里，赖陛下神灵明圣，平定海内，放逐蛮夷，日月所照，莫不宾服。”（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）天上地下所有一切都属皇帝所有，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是占有、支配一切的最主要的根据。

皇帝权力还表现在为民立极。对全国臣民的行为准则和道

德规范作了详尽、具体的规定。所有的臣民都必须按照皇帝的意志和命令行事。刻石中如下一些词句很能说明问题。

“皇帝临位，作制明法，臣下修饬。”

“皇帝躬圣，既平天下，不懈于治。夙兴夜寐，建设长利，专隆教诲。训经宣达，远近毕理，咸承圣志。”

“皇帝作始。端平法度，万物之纪。”

“普施明法，经纬天下，永为仪则。大矣哉！宇县之中，承顺圣意。”

“秦圣临国，始定刑名，显陈旧章。初平法式，审别职任，以立恒常。”

“贵贱分明，男女礼顺，慎遵职事。昭隔内外，靡不清净，施于后嗣。”

“尊卑贵贱，不逾次行。奸邪不容，皆务贞良。”（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）

这类词句不是官样文章，而是为臣民划定行为准则，并宣布皇帝的意志就是命令，所有的人必须遵从，从而把王权至上的思想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在先秦诸子那里，除先王之外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圣与君主是二分的。到了秦始皇时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，皇帝与圣合二为一了。刻石以及大臣的上疏中，把“圣”冠戴到了皇帝的头上。皇帝既然是圣人，是最聪慧、最高明的人，自然又为皇帝裁断一切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根据。

秦始皇的皇帝至上观念，还可以从他取消谥法表现出来。且看他的议论：“朕闻太古有号毋谥，中古有号，死而以行为谥。如此，则子议父，臣议君也，甚无谓，朕弗取焉。自今已来，除谥法。朕为始皇帝。后世以计数，二世三世至于万世，传之无穷。”（《史

记·秦始皇本纪》)在秦始皇的观念中,皇帝生前臣下不能批评,死后也不能议论和评价得失。皇帝是何等的神圣,又是何等的专横!秦始皇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,而其中心是尊君抑臣。《史记·礼书》说:“至秦有天下,悉内六国礼仪,采择其善,虽不合圣制,其尊君抑臣,朝廷济济,依古以来。”

秦王朝虽然很快灭亡了,但秦始皇时期所发展的王权至上观念却成为一个无价之宝,被后世帝王所承继。

第二节 皇帝极欲与重罚主义

秦始皇与秦二世是把极欲和重罚主义付诸实践并发展到极致的人物,为后世留下了反思的资料。

秦始皇统一天下,诏令一统,至尊至贵,“以为自古莫及己”(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),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圣主。他的权力是无限的,欲望是无穷的。概而言之,他的欲望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。

其一是权力欲。这又表现在横纵两个方面。所谓横指空间,凡是人迹所至,日月所照的地方,他统统要君临其上。先秦诸子鼓吹的王天下论,他都要付诸实践。为此他对四夷发动了一系列战争,不惜任何代价。所谓纵,指上下级关系,他不仅要高居于所有臣民之上,深居禁中,诡秘不可测,而且还要独揽一切权力,独断各种事务。“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,上至以衡石量书,日夜有呈(程),不中呈不得休息。”“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,倚辨于上。”(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)看起来很勤奋,但不免陷入事务主义,而他的事务主义是独裁的表现。先秦诸子反复讨论过得天下与失天下的道理。从秦始皇接受邹衍五德终始说看,似乎他承认

了秦德有朝一日会被另一德取代。但实际上,他只想为自己取代别人寻找理论根据。至于有谁会出来取代秦朝,他似乎从未想过,他只想皇帝之位到了他手中,就会万世一系传下去,以至无穷。他的意志和命令也应世世顺承,如泰山刻石中所说:“大义休明,垂于后世,顺承勿革。”为万世立极固然不乏英雄的气概,但又何尝不是企图永远役使人的狂妄表现。

其二是穷奢极欲。天下的臣民、土地都属皇帝所有,他自然就有权使用一切,尽情享乐。秦始皇是不是历史上最奢侈的帝王,这里不去论断,但他的挥霍使整个帝国无法继续存在,也确实堪称典型了。先秦思想家早已看到君王的欲望可能给整个社会造成灾难,一再呼吁节用,并视为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。但是秦始皇父子对这一点全然不顾,秦二世更是借助韩非的理论,把极欲合理化。他的生活哲学是“彼贤人之有天下也,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”,“欲悉耳目之所好,穷心志之所乐”(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)。深明世理,但无节无耻的李斯竟顺应二世之论,说什么“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。能穷乐之极矣”(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)。甚至提出“以人徇己”的主张。秦二世、李斯搬出申不害、韩非为自己辩护,申不害说过,“有天下而不恣睢,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”。韩非似乎没有明说过君主要穷奢极欲,但绝对的君权与极欲两者有内在相通之处,因此,他的君权绝对至上理论无疑为君主的穷奢极欲提供了前提。

至高无上的权力加极欲,必然导致重罚主义。秦氏父子的刀光剑影笼罩了全国,无耻的李斯从理论上对实现极欲必须动用极刑的观点进行了论证,他向秦二世进的督责之术便是铁证。李斯痛骂节俭敢谏之士,指斥这些人是妨碍实现君欲的绊脚石,应该除掉。他说:“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,则荒肆之乐辍矣;谏说

论理之臣间于侧，则流漫之志诎矣；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，则淫康之虞废矣。故明主能外此三者，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，而修其明法，故身尊而势重也。……然后能灭仁义之塗，掩驰说之口，困烈士之行，塞聪掩明，内独视听，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。故能桀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。”又说：“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，长执重势，而独擅天下之利者，非有异道也，能独断而审督责，必深罚，故天下不敢犯也。”（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）秦二世把这一套理论付之实践，造成“刑者相半于道，而死人日成积于市。杀人众者为忠臣”的局面。秦氏父子的重罚政治固然十分可恶，而明知这种行为荒谬却又给这种行为以理论论证的李斯除可恶之外，实在卑鄙。

秦氏父子的极欲与重罚主义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，这是秦帝国迅速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，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反复思考的课题。

第三节 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

秦始皇在思想文化上，开始采用以法家为主、兼蓄并用其他学派思想学说的做法，阴阳家、儒家、道家、宗教神学都有一定的地位。

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被尊为官方思想。秦始皇尊五德终始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：其一，邹衍的五德终始中有“大九洲”说，这为秦的大一统提供了重要依据；其二，五德终始主张朝代在一定条件下应更替，这为秦代周提供了理论依据；其三，在五德终始说中新增了神化秦祖宗的内容，“周得火德，有赤鸟之符。今秦变周，水德之时。昔秦文公出猎，获黑龙，此其水德之瑞”（《史记·